试论北京路县故城遗址出土三联碗

Study on the Triptych Bowl Unearthed from the Heritage Site at the Ancient Government Seat of Luxian County, Beijing

孙勐 魏然

Sun Meng Wei Ran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100009]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Beijing, 100009]

内容提要：2017年，路县故城城外东部墓葬区的考古发掘中，东汉砖室墓M6出土了一件泥质灰陶、施红彩、带提梁的三联碗。这件器物由三个单体的形制基本相同的碗相联而成，整体呈品字形或三角形，内部不贯通。综合考察伴出的其他随葬器物以及M6的形制，推断这件三联碗是整座墓葬中最为特殊的因素。同时，这件三联碗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联体器物，对于从随葬器物、文化因素等方面了解和认识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结合联体器的出土情况和发展脉络，考虑时代相同、地域相近、交通有利、考古学文化交流渊源等因素，推断这件三联碗的形制来源于冀州的满城一带，用于盛放各种半固态食物或大小适当的固态食物。

关键词：三联碗 联体器 东汉 路县故城 满城

Abstract: In 2017, during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of the eastern burial area outside the heritage site at the ancient government seat of Luxian, a triptych bowl with clay gray pottery, paint in red, and a handle was unearthed in a brick chamber tomb M6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is artifact is composed of three bowls of basically the same shape as a single body, and the whole is in the shape of a “品” or triangle, and the interior is not connected. A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of the other burial artifacts accompanying it and the shape of M6, it is concluded that this triptych bowl is the most special factor in the whole tomb. At the same time, this triptych bowl is one of the few conjoined artifacts found in archaeology in Beijing, which is of great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Han Dynasty in Beijing from the aspects of burial artifacts and cultural factors. Combined with the exca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conjoined vessels,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same era, geographical proximity, favorable transportation, and archaeologic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origins, the direct source of this triptych bowl is inferred to belong to the Mancheng area of Jizhou. It is used for holding various semi-solid foods or solid foods of appropriate size.

Key Words: Triptych bowl; couplet; Eastern Han Dynasty; ancient government seat of Luxian County; Mancheng

路县故城遗址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的西北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北部，是一处以路县城址为核心，由城址本体（城墙基址、城壕及其围合区域）、城郊遗址区和外围墓葬区等构成的大遗址。路县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始于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截至2023年12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已在其城郊遗址区发掘约51000平方米，外围墓葬区清理各时期墓葬近万座。路县故城遗址现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发现概况

2017年10月至12月，为配合通州区潞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A-05地块的建设，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其用地范围内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区位于路县故城城外东部墓葬区内，原属于胡各庄村，现东为含英园小区，南邻兆善大街，西为景行路，北为潞源北街。在发掘区内的西南部，清理东汉时期砖室墓1座，编号2017BFA5M6（以下简称M6）。M6的几何中心点西距路县故城东城壕东岸约630米，东城墙基址东边约665米，地理坐标E116° 43′ 55.63″，N39° 54′ 44.29″。

M6方向107°，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南北后室组成。通长16.3—16.6米，墓底距墓口深2.58米。已遭后期严重破坏，未见葬具，在前室内的北部发现少量人骨遗存。前室内的中部偏西出土泥质灰陶罐1件、盘2件、壶1件、方壶1件、三联碗1件（图1）、勺2件、耳杯2件、三足炉1件、狗1件等；北后室内出土少量东汉时期五铢钱。其中的三联碗（M6：7），在北京地区的考古中颇为少见，较为特殊，对于从随葬器物、文化因素等方面了解和认识北京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较为重要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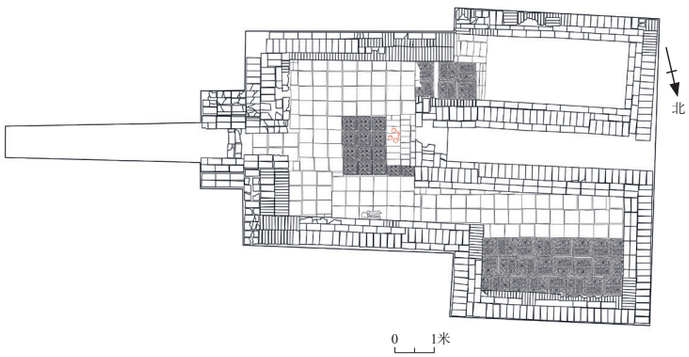


图1 三联碗出土位置示意图

二、形制特点

这件三联碗由三个单体的形制基本相同的碗相联而成，整体呈品字形或三角形。每个单体的碗为直口，圆唇，深腹，外腹壁斜直，近底部向下斜折内收，假圈足。口沿下、上腹部有一周凸弦纹。每个碗的内壁均有红色彩绘遗存。三个碗的外壁一侧，从口沿至上腹部相联，之间留有一个近似圆形的穿孔。口径11.6、底径7—7.6、通高6.4—6.8 厘米。与三联碗相配套的还有一件提梁，已残（图2—图4）。

三联碗为泥质灰陶，与北京地区东汉时期陶器的陶质陶色



图2 三联碗



图3 三联碗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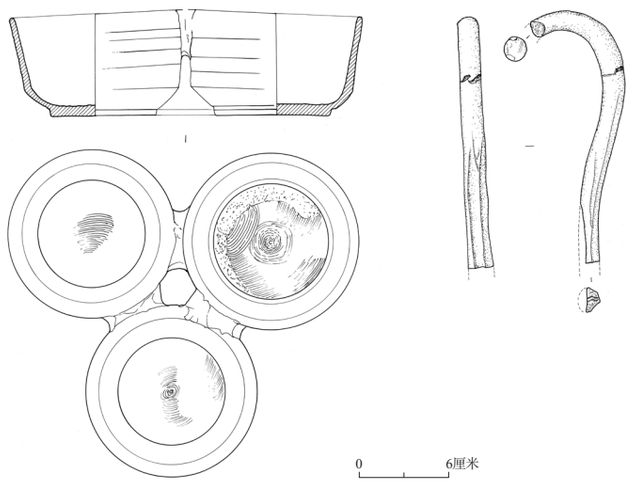


图4 三联碗线图

相同。从碗内底的轮制痕和圈足底面的旋切痕来看，每个单体的碗均由轮制而成，然后再粘连在一起，可知该器同时使用了轮制和手制。这件三联碗制作规整，从制作工艺的角度讲并不复杂，不需要具有特殊技术或才能的工人完成。碗内壁的红彩，也是北京地区东汉时期随葬陶器常用的装饰方式与颜色①。因此，从材质、制作工艺和装饰等方面来看，这件器物并无特别之处，并可推断该器的出土地完全有可能就是制作和生产地。这件器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形制与构成，即三个基本相同的单体碗外部联接构成一件联体器，而内部不相贯通，即联而不通。这一形制特点，直接来源于何处？与其所属墓葬的整体面貌是否一致？

三、文化因素分析

与这件三联碗伴出的器物有泥质灰陶罐、盘、壶、方壶、勺、耳杯、三足炉、狗等。尽管墓中完整的器物组合已无法知晓，不过从仅存器物的种类、数量和形制来看，可以断定除这件三联碗之外，其他器物均是北京地区东汉时期砖室墓中常见的随葬品。这件三联碗所属的遗存单位M6，为单墓道、横前室、双后室，形制与结构是北京地区东汉晚期砖室墓的典型样式之一[1]，也并无特别之处。综合来看，这件三联碗是整座墓葬中最为特殊的因素。

三联碗在北京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随葬器物中并不多见，目前只能将之与其他地区出土的联体器相比较，采用文化因素分析法进行探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2]，“其要义，简单讲就是分析出一个考古学遗存内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的组成情况，以认识其文化属性，即确定它在考古学文化谱系中的位置”[3]。由此产生的认识既关系到器物本身，也关系到该墓整体的文化属性。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这件三联碗是北京考古出土的最早的联体器之一。也可以说，东汉之前，北京没有联体器。考虑到三联碗是在北京地区没有相应观念、制作和使用传统的时空环境或背景中出现的，就有必要从联体器的整体考古发现中追寻线索。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联体器主要有陶器、瓷器、青铜器、漆木器等。

① 为了解红彩构成物质，使用美国NITON公司便携式X射线荧光能谱仪XL3T950对器物内壁附着红彩进行检测，其成分以铁元素为主，未见汞元素，故推测颜料为铁红。

（一）陶、瓷联体器

1977年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的M4中出土双联鼎一件[4]，上身为两个相连的小口圆底罐，每罐腹下侧均有两条圆柱状的长鼎足。河南巩义塌坡遗址采集仰韶文化晚期的双联盆形鼎一件，夹砂褐陶，为两盆形鼎相连，四鸭嘴形扁足[5]。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大溪文化的三联罐一件，泥质黑陶，倒扣杯式圈足，上接三个小罐，呈匀称三角形[6]。1974年甘肃掌坪遗址征集马家窑类型的高足三联杯一件，泥质红陶，高圈足上附三个等大的杯[7]。

1976年四川西昌礼州发掘的遗址中，BM3出土双联罐两件，形制相同，将两个双耳罐口部用泥条连接在一起，为殷商晚期[8]。1980年甘肃庄浪县徐家碾村发现的寺洼文化墓葬中，M84出土了双联鬲一件和五联杯一件，前者是用泥条把两件鬲的袋足连接在一起；后者上部是五个深腹圜底杯，与下部的圆筒形座相连，为商末至西周早中期[9]。1993年河南平顶山发掘的墓葬中，M232（应公墓）出土三盘联体的青瓷豆一件，“上部为三个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的浅豆盘，下部共用一个筒状圈足”，为西周早期[10]。1995年山东章丘孟白村战国墓M1中出土双联碗一件[11]，泥质灰陶，豆柄形底座上承两个碗形器。

河南洛阳烧沟汉墓中，M8出土双联罐一件[12]，两罐中间夹一提梁，为西汉中期偏晚。湖南资兴发现的西汉墓中，M342出土五联罐一件，整体形制是中间一小罐与周围四罐相联，带环钮盖[13]。1951年长沙发现的战国两汉墓葬中，西汉晚期墓M339出土红陶五联罐一件，无盖，其中四件较大的罐的肩部各有一个横向的系[14]。陕西西安西咸新区西石羊村发现的西汉墓中，M41出土青瓷三联罐一件，无盖[15]。济南市博物馆收藏负壶陶鸠、负鼎陶鸠各一件[16]，分别是两壶、两鼎置于鸠鸟双翅之上，为西汉时期。广西和广东是西汉时期联体陶器出土类型最为多样和数量最为集中的区域，包括联体罐（双、三、四、五、六联罐）、联体盒（四、八联盒）、联体盂（双、三联盂）等，以联体罐数量最多[17]。其中，仅有广州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内发现的一件五联罐出自遗址[18]，其余均为墓葬随葬品。

东汉时期，在岭南地区联体陶器仅零星发现于广东南海，广西钟山和平乐、合浦[19]。1959年陕西潼关吊桥发掘的杨氏墓葬群中，M5出土三联罐一件[20]，泥质红陶，附有提梁，为东汉晚期。陕县M2076出土双联罐一件[21]，两罐相连，中间安一把手，为东汉晚期。1985年山西临汾曲沃苏村发掘的一座东汉晚期墓葬出土三联碗一件，附有提梁[22]。1987年襄汾出土三联碗一件[23]，有一环形提梁。侯马乔村M7229出土三联碗一件[24]286-287，红胎绿釉陶，为东汉晚期（图5）。河北望都二号汉墓发现一件朱绘提梁三联碗，通高44.2厘米[25]8（图6）。满城宏昌园B区东汉砖室墓M9中发现一件提梁杯。“三杯俯视呈‘品’字形，中部一环形提梁。杯敞口，圆唇，斜壁，矮圈足。杯内饰红色彩绘，一杯内放置一彩绘陶勺。杯口径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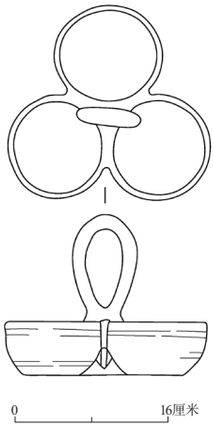


图5 山西侯马乔村墓地出土三联碗（M7229:11）[24]图一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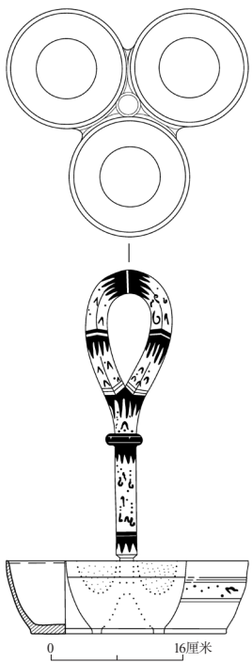


图6 河北望都二号汉墓出土朱绘提梁三联碗[25]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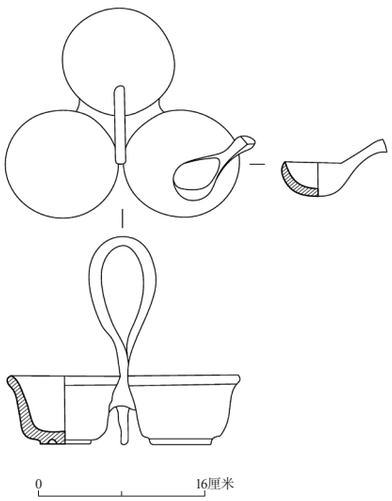


图7 河北满城宏昌园B区东汉砖室墓出土提梁杯（M9:35）[26]

厘米，高7.5厘米。通高20厘米”[26]（图7）。北京市海淀区清河东汉墓出土三联碗一件①。

（二）青铜、漆木联体器

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偶方彝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联体青铜器[27]。1963年辽宁宁城南山根石椁墓中出土双联罐一件，带半球形盖，两罐的腹部由两条上下平行的铜梁相连接，为春秋时期[28]。1985年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村石椁墓中出土双联罐、四联罐和六联豆各一件，为春秋时期。六联豆正中为一圆形圜底罐，肩部分铸六个小錾耳，耳接铸六个形制、大小相同的浅盘豆[29]。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杞伯双联鬲一件，两鬲一足的外侧连铸，为春秋早期[30]。2000年山东郯城县大埠二村发掘的M1中出土双联罐一件[31]，为春秋中期。2000年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发掘的M11出土提梁双壶一件[32]，为战国晚期。1981年陕西咸阳博物馆征集四联鼎一件[33]，为西汉中期。河北满城二号汉墓中出土朱雀衔环杯一件[34]。陕县M3003出土双联行灯一件[35]，为西汉时期。

1996年在新疆且末县发掘的扎滚鲁克一号墓地中，M24出土双联木杯一件，用整木刮挖雕刻而成[36]。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中出土双联木杯一件，“整木制成，两筒形平底木杯对称相连，两杯口之间相连处雕一方孔”[37]。湖北包山2号楚墓中出土凤鸟形双联漆杯一件[38]，为战国中期。

上述出土的联体器，按单体器物的类型，有鼎、豆、罐、盒、盂、彝、壶、杯、行灯等；按单体器物构成的数量，可分为双联、三联、四联、五联、六联和八联等；按平面形状，可分为直线型、三角形或品字形、方形或长方形等。它们的共同之处，一是两个或多个形制基本相同的单体器物的外部相连接，固定且不可分开；二是器物的内部不相贯通。这类联体器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主要分布在中原、西北地区，经殷商和西周有所发展，从陶器扩展到青铜器②。至春秋战国时期，材质上增加了漆木器，地域扩展到山东中部和南部、东北、荆楚地区。西汉时期，联体器不仅在岭南地区迅速发展，还扩展到河北中部。东汉时期，广东和广西出土联体陶器的类型和数量迅速减少，而在关中、豫北、晋南、河北等地均有发现③。

总体而言，联体器出现的时间较早，延续的时间较长，但出土的数量、发现的地点并不多，也就是说分布和流行的区域较为有限。路县故城出土这件三联碗源自何时、自何地传入北京地区，非常值得探讨。这件三联碗作为随葬器物，时代与其所属墓葬的时代均为东汉晚期，因此推断其传入北京地区的时代也在东汉晚期或略早。其形制与潼关、曲沃、侯马、襄汾、望都、满城出土的器物近似。这几座墓葬中，仅潼关M5出土镇墓瓶上有“建宁元年（168年）”纪年，望都二号汉墓出土买地券上有“光和五年（182年）”纪年，尽管目前尚无法排列出它

① 承蒙白岩研究馆员指导并提供资料，这件三联碗未见正式发表，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② 商周时期有一种类似四联器的器物，或称器座，或称调色器，因其筒状孔洞不可作为单体器物使用，故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可参考俞凉亘《铜四足器座小议》，《文物》1999年第1期；胡洪琼、申明清《商周时期盛色器功用考辩》，《中原文物》2013年第6期。

③ 东汉中晚期出现并开始流行一类叫“五联罐”的器物，而此类“五联罐”是该器物用途不明的情况下根据其造型特征命名的，其形态结构和功能用途与本文所述的五联罐并不相同，因此不予讨论。可参考仝涛《五联罐和魂瓶的形态学分析》，《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但定在东汉晚期应该无误。考虑到这几座墓葬的发现地点均位于北京的西南一线，而属于冀州的望都、满城（均属于中山国）与属于幽州的北京在考古学文化上渊源深、联系紧，器物使用与制作观念更为接近，人员往来与迁徙更为便利，并且两地之间拥有实现这种社会文化交流的交通优势，加之目前发现的数量有限，因此只能暂且推断这件器物的直接来源有可能是河北中部一带。

这件器物的特殊性或者对北京地区东汉时期考古学文化而言具有的“外来性”，使该座墓葬的考古学文化也具有相应的特殊因素。不过，总体来讲，该墓的主体文化因素还是本地区因素。

四、功能与用途

一般而言，器物的形制是由其功能、用途决定的，二者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相应地，这件三联碗的特殊形制就是其特定功能和用途的表现。对于这件三联碗，可从在墓葬中的功能和用途、作为非随葬用品时的功能和用途两个方面考虑。当然，由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流行观念，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具有对应关系。它首先是明器，即专门为了丧葬而制成的非实用的模型性、象征性的随葬品，和生者所用之器有别[39]。这从其施彩涂朱、提梁不具实用功能等方面也可看出。它与共出的盘、壶、耳杯、勺等构成一套符合当时当地礼俗传统与要求的随葬器物组合。由于该墓已被破坏，这件三联碗是否曾盛放物品并不清楚，因此它在该墓葬的具体用途也就不能确定。不过，可以根据其他墓葬中的发现情况加以推断。

目前所见，联体器绝大多数都出自墓葬。除了作为随葬器物，其具体功能主要可以分为三类：酒器、食器和灯具。酒器以部分双联杯和双联壶为代表，可作为饮用和盛放酒的器具[40-42]。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的双联罐内分别装有肉食和瓜果，四联罐内分别装有鱼、肉、韭菜、瓜果等。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墓出土的三件五联罐内，装有捣碎已胶结的植物叶渣[43]。广州汉墓西汉早期M1170出土的五联罐内“有植物叶子的残痕、压叠成层”；西汉中期M2060出土的五联罐内有李核[44]。孙机认为岭南地区西汉早期墓中常出的各种陶质联体器主要用于盛放果品[45]。上述发现可作为盛放食物器具的代表。章丘孟白村战国墓M1出土的陶质双联碗，发掘者将其定为灯形器；陕县M3003出土青铜双联行灯一件；曲沃、侯马、襄汾各一件，发掘者将其定为灯或吊灯。这些器物可作为灯具的典型。从时代和形制来看，路县故城出土的三联碗与曲沃、侯马、襄汾发现的器物相近，均为品字形带提梁，从这一点上看似乎存在作为吊灯使用的可能。但再看满城出土的三联杯，内置一陶勺，二者应是组合配套使用的关系，由此可知这件器物并非灯具，而很有可能盛放食物。路县故城和满城出土的器物，不仅形制，质地、装饰也基本相同。结合上文推断路县故城出土三联碗形制的直接来源有可能是满城，因此本文更倾向于路县故城出土三联碗为盛放食物的器具。

另外，三联碗和其他联体器，相较于单体器物，除了数量增多，伴随而来的最主要变化是从增广横向空间面积实现了总体容量增大和分隔功能增加。加之“联而不通”的特点，不仅可以盛放大小适当的固态食物，还可根据实际需要同时容纳半固态食物。

以三联碗为代表的这类联体器，因需要同时盛放不同种类的食物，出现了“联而不通”的形制与构成特点。另有一类联体器，外在形制与本文所述联体器相似，但是器物的内部却是贯通的。如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联壶，为鼓腹平底的两壶并列，腹部相接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46]。1963年在新疆阿勒泰市发掘的切木尔切克（克尔木齐）墓地中，M3出土双联石罐一件，两罐之间有一个狭长穿孔[47]。1976年辽宁抚顺清原县任家堡大南沟发掘的一座石棺墓中出土泥质黄褐陶双联罐一件，中有小孔相贯通，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48]。这类“联且相通”的联体器，内部有贯通的穿孔，只能用于盛放同一种类的液体，不适合盛放不同种类的液体以及固态或半固态的食物。基于这一差别，本文未加讨论。

路县故城城外东部墓葬区M6出土的三联碗，是北京地区考古发现的为数不多的联体器物，也是该墓唯一具有“外来性”的器物。其“外来性”，主要表现在形制方面，而从材质、制作技术和装饰上看，完全有可能是在本地区生产的器物，不需要将成品从异地运输或贸易而来。总体而言，这件三联碗的“特殊性”尚不能影响该墓考古学文化的本地区面貌。

结合联体器的出土情况和发展脉络，根据器物的形制和构成特点，考虑时代相同、地域相近、交通有利、考古学文化交流渊源等因素，推断这件三联碗的形制来源于冀州的满城一带。当然，这种物质上的文化交流与影响，由于发现的数量有限，只能是一种推断，有待今后发掘资料的进一步证实。

综合目前的考古学认识，三联碗有灯具、食器两种功能，路县故城出土的这件三联碗更有可能是盛放各种半固态食物或大小适当的固态食物的容器。这应是形制相似器物的具体功能和用途在不同地域存在差异的一种表现。另外，三联碗或者类似的联体器物，在东汉时期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并不普及，接受度不高，不是本地区的常见、惯用器物。同时，这种器物在北京地区流行的时间非常有限，东汉以后就消失了。

参考文献

[1] 胡传耸. 北京考古史: 汉代卷[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67.

[2] 李伯谦. 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M]//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297.

[3] 俞伟超. 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M]//考古学是什么: 俞伟超考古学理论文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119.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 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79(2).

[5] 巩义市文物管理所. 河南巩义市塌坡仰韶文化遗址调查[J]. 考古, 1997(11).

[6]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澧县城头山: 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 381−382.

[7]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甘肃分队. 白龙江流域考古调查简报[M]//文物编辑委员会. 文物资料丛刊: 2 .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78: 31.

[8] 礼州遗址联合考古发掘队. 四川西昌礼州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 1980(4).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泾渭工作队. 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发掘纪要[J]. 考古, 1982(6).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局. 平顶山应国墓地: Ⅰ上[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2: 58−59.

[11] 章丘市博物馆. 山东章丘市孟白战国墓[J]. 考古, 1999(11).

[1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9: 97−98.

[13] 湖南省博物馆,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资兴西汉墓[J]. 考古学报, 1995(4).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长沙发掘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104.

[1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西安西咸新区西石羊汉墓发掘简报[J]. 文博, 2020(6).

[16] 济南市文物局, 济南市博物馆, 济南市考古研究所. 济南文物精粹: 馆藏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8: 19−20.

[17] 周繁文. 秦汉时期岭南联体陶器研究: 以五联罐为主[J]. 东南文化, 2018(6).

[18] 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南越宫苑遗址: 1995、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132.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 钟山县博物馆. 广西钟山县张屋东汉墓[J]. 考古, 1998(11).

[20]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J]. 文物, 1961(1).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县东周秦汉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69−170.

[22] 临汾地区文化局, 曲沃县文化馆. 晋南曲沃苏村汉墓[J]. 文物, 1987(6).

[23] 李学文. 山西襄汾出土三件汉灯[J]. 文物, 1991(5).

[2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5]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望都二号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59.

[26] 满城县文物局. 满城宏昌园B区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春秋, 2012(3).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J]. 考古学报, 1977(2).
[28] 辽宁省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 宁城县南山根的石椁墓[J]. 考古学报, 1973(2).
[29] 项春松, 李义. 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J]. 文物, 1995(5).
[30] 田率. 国家博物馆新入藏的两周青铜器管见[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5(5).
[3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临沂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郯城县文物管理所. 郯城县大埠二村遗址发掘报告[M]//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海岱考古: 第四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1: 123.
[3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葫芦岛市博物馆, 建昌县文物局. 辽宁建昌东大杖子墓地2000年发掘简报[J]. 文物, 2015(11).
[33] 李光军, 张子波. 西汉馆陶家铜连鼎及王氏一斗鼎[J]. 文物, 1984(10).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 满城汉墓发掘报告: 上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265, 267.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县东周秦汉墓[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4: 183−184.
[3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且末县文物管理所.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一号墓地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03(1).
[37] 荆州博物馆. 湖北荆州望山桥一号楚墓发掘简报[J]. 文物, 2017(2).
[38]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墓地整理小组. 荆门市包山楚墓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5).
[39] 林沄. 周代用鼎制度商榷[J]. 史学集刊, 1990(3).
[40] 李仰松. 试谈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双连杯”和“三耳杯”及其有关问题[J]. 河南文博通讯, 1980(4).
[41] 王子今. 秦汉时代的双连杯及其民俗学意义[J]. 考古与文物, 1986(5).
[42] 鲁礼鹏. 新疆出土双联器初探[J]. 北方文物, 2017(2).
[43]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103.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广州市博物馆. 广州汉墓: 上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101.
[45]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500.
[46]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遗址[J]. 考古, 1973(6).
[47] 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疆克尔木齐古墓群发掘简报[J]. 文物, 1981(1).
[48] 佟达, 张正岩. 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石棺墓[J]. 考古, 1989(2).